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汉语史纲要



HANYUSHI GANGYAO

殷国光 龙国富 赵彤 编著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汉语史纲要



HANYUSHI GANGYAO

殷国光 龙国富 赵彤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史纲要/殷国光,龙国富,赵彤编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6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ISBN 978-7-300-13891-6

I. ①汉… II. ①殷…②龙…③赵… III. ①汉语史-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H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48606号

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21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

汉语史纲要

殷国光 龙国富 赵彤 编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85mm×260mm 16开本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印 张	26.25插页1	印 次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570 000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绪 论	1
-----	---

第一编 汉语语音史

第一章 上古汉语的语音系统	15
第一节 上古汉语的声母	17
第二节 上古汉语的韵部	30
第三节 上古汉语的声调	53
第二章 汉语语音从上古到中古的发展	57
第一节 《切韵》音系	58
第二节 汉语声母从上古到中古的发展	65
第三节 汉语韵母从上古到中古的发展	74
第四节 汉语声调从上古到中古的发展	93
第三章 汉语语音从中古到近代的发展	97
第一节 《中原音韵》音系	98
第二节 汉语声母从中古到近代的发展	101
第三节 汉语韵母从中古到近代的发展	107
第四节 汉语声调从中古到近代的发展	117
第五节 普通话语音系统的形成	124

第二编 汉语语法史

第一章 名词的发展	139
第一节 上古汉语名词的特点	140
第二节 名词前缀“有”、“阿”、“老”	141
第三节 名词后缀“子”、“儿”、“头”	145
第四节 后缀“们”的产生和发展	150
第二章 数词和量词的产生及其发展	153
第一节 数词的产生和发展	154
第二节 量词的产生和发展	161
第三章 代词的发展	176
第一节 人称代词的发展	177
第二节 指示代词的发展	186



第三节 疑问代词的发展·····	192
第四章 动词的发展 ·····	201
第一节 上古汉语动词的特点·····	202
第二节 动态助词“了”的产生和发展·····	202
第三节 动态助词“着”的产生和发展·····	208
第四节 动态助词“过”的产生和发展·····	211
第五章 形容词的发展 ·····	214
第一节 形容词在上古文献中的分布·····	215
第二节 结构助词“底”、“地”、“的”的产生和发展·····	216
第六章 系词的产生及其发展 ·····	226
第一节 关于系词的界定·····	227
第二节 上古汉语判断句的分布·····	228
第三节 系词的产生及其发展·····	230
第七章 语序的发展 ·····	237
第一节 宾语与动词、介词语序的发展·····	238
第二节 介宾结构与述谓中心语序的发展·····	242
第三节 数量短语与名词语序的发展·····	247
第八章 动补结构的产生及其发展 ·····	251
第一节 动结式的产生和发展·····	252
第二节 动趋式的产生和发展·····	260
第三节 带“得”动补结构的产生和发展·····	265
第九章 处置式的产生及其发展 ·····	273
第一节 处置式的类型·····	274
第二节 处置式的产生及其发展·····	276
第三节 处置式的来源和形成机制·····	284
第十章 被动式的产生及其发展 ·····	289
第一节 被动式的界定·····	290
第二节 被动式的类型·····	291
第三节 被动式的产生及其发展·····	294
第四节 被动式的来源和形成机制·····	305
第十一章 语气词的产生及其发展 ·····	310
第一节 上古汉语语气词系统·····	311
第二节 中古、近代语气词的发展·····	313
第十二章 汉语语法发展的趋势 ·····	329
第一节 词法的发展·····	330
第二节 句法的发展·····	343

第三编 汉语词汇史

第一章 构词法的发展·····	355
第一节 上古汉语的构词法·····	356
第二节 中古构词法的发展·····	364
第三节 近代构词法的发展·····	368
第二章 词义的发展和变化·····	372
第一节 什么是词义的发展变化·····	373
第二节 词义发展的几种方式·····	375
第三章 词汇的兴替·····	380
第一节 新词的产生·····	381
第二节 旧词的消亡·····	383
第三节 词汇的替换·····	385
第四章 谚语和成语的发展·····	388
第一节 上古的谚语和成语·····	389
第二节 中古以后谚语和成语的发展·····	392
第五章 外来文化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396
第一节 西域文化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397
第二节 佛教文化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399
第三节 满蒙文化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401
第四节 西方文化对汉语词汇的影响·····	404
本书主要参考文献·····	410
后记·····	411



绪 论

一、汉语史研究的对象和任务

自古至今，汉语一直存在着众多的方言；与此同时，为了交际的需要，也始终存在着超越方言的汉民族共同语；汉民族共同语是汉语史研究的对象。

汉语史的任务是研究汉民族共同语历史发展的规律：要弄清汉语在不同历史时期语音、词汇、语法的基本面貌和特征；了解汉语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化；探索这些发展变化的特点和原因，揭示汉语发展变化的内部规律。

研究汉语史对于深入了解和正确使用现代汉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不了解汉语的历史，现代汉语中的许多现象将无法解释；如果没有历史的依据，将无法建立起现代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规范。此外，研究汉语史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学、文化历史的研究，对于普通语言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二、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

汉语的名称正如汉族的名称一样，源于汉代，但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则要追溯到

夏、商、周三代。商灭夏，继承了夏的文化；周灭商，继承了商的文化。正如孔子所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① 我们所见到的最早的汉字系统是殷商时代的甲骨文。西周的金文与殷商的甲骨文在文字系统上是一脉相承的。甲骨文记录的是商部族的语言，金文记录的是周部族的语言。商代的甲骨卜辞、西周的铜器铭文在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上属于同一个语言系统，语音成分亦有相承关系。由此可以推测，商、周部族的语言当属于同一语系。周灭商后，迁殷“顽民”于成周（故址在今洛阳东），后来平王东迁洛邑，促进了商、周部族的融合。周代的“雅言”就是商、周部族语言融合的结果。

“雅言”之称，始见于《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郑玄注云：“读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后义全。”清代学者刘台拱在《论语骈枝》中进一步阐发郑注的观点：“夫子生长于鲁，不能不鲁语，惟诵《诗》、读《书》、执礼，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训典，谨末学之流失。”这就是说，孔子生长在鲁国，日常交际都是用鲁语，但在诵读《诗》、《书》的时候，在执行礼仪的隆重场合，一定要用“雅言”。

“雅言”是什么？《荀子·荣辱》：“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清代学者王引之曰：“雅读为‘夏’，夏谓中国也。”^② “雅言”就是夏言。中国，即指中原诸夏各国。因此，周代的“雅言”可以说是有文献记载的、通行于中原诸夏各国的官方语言，是最早的汉民族共同语（或称“华夏语”）。^③ 其标准音当是河洛一带的中原雅音。春秋时期，中原诸夏之地方言众多，然而天子接受诸侯的朝觐，诸侯国之间聘问会盟，以及孔子周游列国，等等，未闻存在语言的障碍，正是由于“雅言”存在的缘故。

考察《诗经》十五国风，虽采自黄河中下游乃至汉水流域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但用韵基本一致，并无明显的方言差异；即使是代表南方楚文化的楚辞，其声韵调系统虽有自身的特点，但与《诗经》亦基本相合。这表明，春秋战国时期的传世文献，虽然不免有地域方言的色彩，但基本上都是用“雅言”记录下来的。

先秦的“雅言”，到了汉代被称之为“通语”、“凡语”。扬雄《方言》卷一：“恹、恹、怜、牟，爱也。韩郑曰恹；晋卫曰恹；汝颍之间曰怜；宋鲁之间曰牟，或曰怜。怜，通语也。”又：“嫁、逝、徂、适，往也。自家而出谓之嫁，由女而出为嫁也。逝，秦晋语也；徂，齐语也；适，宋鲁语也。往，凡语也。”“通语”、“凡语”是“雅言”的延续。随着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的疆域不断扩大，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通语”通行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东汉的学者王充在《论衡·恢国》中说：“巴、蜀、越、崑、郁林、日南、辽东、乐浪，周时被发椎髻，今戴皮弁，周时重译，今吟《诗》《书》。”这说明在周代尚需辗转翻译才能交际的四川、广西、辽东半岛等

① 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

② 见王先谦《荀子集解》。

③ 关于“雅言”，另有一说。朱熹曰：“雅，常也；执，守也。诗以理情性，书以道政事，礼以谨节文，皆切于日用之实，故常言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列此以备考。

边远地区，在汉代已能用中原雅音吟诵儒家经典了。

汉代以后，汉民族共同语一直沿用“通语”的称谓，直至明清而改称“官话”，晚清之后改称“普通话”（又称“国语”）。

汉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与发展（从周代的“雅言”到现代汉语的普通话）处在不断地融合与分化之中。周代“雅言”的形成就是商、周两大部族语言融合的结果。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多次入主中原（如：北朝、元代、清代），促使少数民族语言与汉民族语言大规模地融合。在少数民族融入汉文化中的同时，少数民族的语言也随之被汉语同化。汉民族共同语保留了自己的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吸收了少数民族语言的词汇，从而丰富了自己。

历史上，汉族人几次大规模地由中原地区向南方迁徙，一方面，汉民族共同语随之传播到南方，起到了推广汉民族共同语的作用，使得汉民族共同语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另一方面，由于中原地区的汉语（尤其是语音系统）发展变化的速度较快，而处在南方的汉语发展变化则相对滞后，加之与当地固有的土著语言的接触与融合，汉民族共同语逐渐分化而演变成汉语的各个方言。例如粤方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征发刑徒 50 万人戍守五岭，他们以当时的“通语”作为交际工具；汉武帝时平定南越国，始设“交趾刺史部”监察各郡，治所设在广信（今广西梧州与广东封开一带），并派使者从合浦出发，开通了海上丝绸之路。随着官府的设置，以及贸易、文化的发展，一方面，官方交际要讲“通语”，“通语”逐渐成为当地土著部落的共同语；另一方面，“通语”也吸收了当地土著语言（古百越语）的词汇，为以后粤方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又如客家方言：东晋永嘉以后，直到元明时期，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大批中原地区的汉人先后经历几次大规模地举族南迁，迁至闽、粤、赣等地区，这就是所谓“客家”；客家先民使用的“通语”与当地土著语言接触、融合，逐渐演变成客家方言。吴方言、闽方言、赣方言、湘方言等也都是历史上不同时期从汉民族共同语分化出来的。

汉民族共同语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等条件下自然形成和传播的。从夏、商、周三代开始，中国政权统一的时候，一向建都北方（元代以前都是在中原地区，元代至今在北京），发源于中原地区的汉文化一直处在强势地位；因此，汉民族共同语从一开始一直就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的。至于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则与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往往是帝都）所在地的方言有着直接的关系。大体上说，清代以前，汉民族共同语以中原语音（洛阳一带的语音）为标准音，自清代开始，逐渐转变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

三、汉语史研究的依据

王力先生曾多次说过，汉语史研究有两种材料，一种是死的材料，这就是各个时期的历史文献；一种是活的材料，这就是各地的方言。



(一) 历代的书面语言

古代汉语都是通过书面语言的形式保存下来的，所以，研究汉语史最基本的材料是历代的书面语言。记录汉民族共同语的书面语言有文言、白话之分。周代的“雅言”是文言的源头，汉代的“通语”与“雅言”一脉相承，都是用文言记录的。文言基本上反映了周秦至西汉时期口语的面貌。大约东汉初年，文言开始逐渐脱离口语；南北朝时期，白话已初见端倪，至唐宋而日趋成熟，成为汉民族共同语的书面语的新的形式。因此，研究周秦至西汉时期汉语的依据是文言文献，研究唐宋直至清代汉语的依据是白话文献。

文言文献包括十三经、先秦诸子、前四史等。

白话文献包括敦煌变文、宋人语录、汉译佛经、白话小说（唐代传奇、宋元话本、明清小说）、元杂剧等。

历代的书面语言（无论是文言，还是白话）虽然不是自然语言（口语），但它与自然语言的关系只是加工和未加工的区别；尽管二者在修辞表达、言语风格等方面存在着种种差异，但是在语言系统上是一致的。^① 因此，我们依据历代的书面语言所做的汉语史研究，应该能够基本上反映出汉语自然语言的历史变化。

依据历代的书面语言研究汉语史要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1) 要注意甄别历史文献语言的时代。

依据历史文献研究汉语，首先有个辨伪的问题。即以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尚书》为例，先要把仿古之作《伪〈古文尚书〉》排除；^② 即使是作为儒家经典传世的今文《尚书》，其《虞夏书》也不过是托古之作，不能真的把它看做是尧、舜、禹三代之文。《尚书》尽管记录了盘庚迁殷、商汤伐桀等真实的历史事件，但其语言却与《周书》基本一致，显然已不是商部族语言的原貌了，或是周代史官用“雅言”整理过，或者就是殷商后人（宋人）的述古之作。^③

即使写作时代确定的历史文献，也要注意其语言内部存在的时间层次。例如《史记》，作者（司马迁）、写作年代（汉武帝之时）十分确定，但如果将其语言笼而统之地视为西汉时期的语言，视为一个纯粹的共时系统，是有问题的。考察《史记》的语言，至少可以分为两部分：《本纪》、《世家》、《列传》中记载秦及秦以前的历史和人物的内容，如《五帝本纪》、《吴太伯世家》、《伯夷列传》等；《本纪》、《世家》、《列传》中记载汉代历史和人物的内容，如《项羽本纪》、《陈涉世家》、《张耳陈馥列传》

① 书面语偶或也有与口语的语言系统不同的情况，例如汉语曾被日本、朝鲜、越南用作古代的书面语，那是由特定的历史、社会条件造成的。

② 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賾向朝廷献汉代孔安国的《孔传古文尚书》，明代梅鷟著《尚书考异》、清代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论定《孔传古文尚书》是伪作。

③ 屈万里《尚书今注今译》：“书序谓本篇作于盘庚时，《史记·殷本纪》以为作于小辛时。按：本篇数言盘庚，而盘庚之名，乃其后人所命，非盘庚在世时之称，可知本篇非当时所作。小辛时亦不当有‘盘庚’之号，故知亦非作于小辛时也。疑为殷末人（甚至宋人）述古之作。”

等。司马迁著《史记》，在记录秦及秦以前的历史时，博采周秦典籍，除直接引文（如《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出游刻石之辞）之外，不少文字亦直接抄录先秦的文献（如《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吕氏春秋》等），^① 因此，第一部分文献的语言主要反映的是周秦时期语言的特点，其语言具有存古的性质，不宜作为研究西汉语言的典型语料；^② 司马迁在记录汉代的历史和人物时，并无先秦文献可征，是用自己的语言进行创作，因此，第二部分文献的语言才较多地反映了西汉时期语言的特点。

(2) 要正确认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在汉语史研究中的地位。

历史文献分为两大类：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凡经过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文献，如各类刊本、排印本、传抄本等，称为传世文献；凡近代从地下发掘出来的文献，如甲骨卜辞、铜器铭文、简牍帛书、敦煌写卷等，称为出土文献。出土文献由于长期掩于地下未经流传，因而真实地保留着当时的面貌，具有极高的科学价值；传世文献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经过反复传抄，多次校勘，多次刊刻，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失真”。即以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楚简《缁衣》以及1994年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简《缁衣》，与传世文献的《缁衣》相较，文字出入甚大，可见一斑。

依照常理，汉语史的研究当以出土文献为基本材料，而以传世文献为旁证，^③ 实则不然；因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古代文献绝大部分是传世文献。传世文献数量大，资料丰富，保存完整；而出土文献则数量少，资料相对单一、零散；因此，总体上说，作为汉语史研究依据的历代书面语当以传世文献为主。^④ 当然，在汉语史的研究（尤其是上古汉语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密切关注考古界的新的发现，充分利用已经发掘出的出土文献材料。只有将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才能得到更为科学的结论。

(二) 传统语言学的研究成果

传统语言学旧称“小学”，源远流长，遗产丰富。其成果大体可以分为文字、音韵、训诂三类。研究文字的字书有《说文解字》、《玉篇》等；研究词汇词义的义书有《尔雅》、《方言》、《释名》等；研究音韵的音书有《切韵》、《广韵》、《中原音韵》等。

① 据宋亚云统计：《周本纪》全文九千多字，竟有五千多字可以直接从《尚书》、《国语》、《左传》、《战国策》、《逸周书》、《诗经》、《吕氏春秋》等文献中找到相应甚至完全相同的文字。又，比较《战国策》和《史记》中相同或相关的105个故事，排比其文字异同，相同或相关的文字部分，见于《战国策》的有58700字左右，见于《史记》的有55700字左右。（博士论文《汉语作格动词的历史演变及相关问题研究》22~23页）

② 当然，在第一部分文献中，司马迁在博采先秦典籍的时候，亦有不少加工、改动之处，排比这些语料，比较其异同，亦可从局部探究语言的发展。

③ 日本汉学家太田辰夫在《中国语历史文法》中，把文献分为“同时资料”和“后时资料”。出土文献都是“同时资料”，或“准同时资料”，而传世文献都是“后时资料”。中译本见[日]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381~38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④ 不能一概而论。如研究殷商的语言，依靠的只能是出土文献——甲骨卜辞。

以段玉裁、王念孙为代表的“乾嘉学派”使“小学”的研究达到了巅峰，其研究成果都是汉语史研究的依据。

此外，古人的注疏也是“小学”的研究成果。其内容十分丰富，除了注音、释义之外，还可以从中窥见语法分布的历史变化。仅以郑玄注《诗经》为例：^①

岂不尔思，子不我即。（《郑风·东门之墀》）郑玄笺：我岂不思望女乎？女不就迎我而俱去耳。

无我恶兮。（《郑风·遵大路》）郑玄笺：子无恶我。

（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

四方是维，天子是毗。（《小雅·节南山》）郑玄笺：毗，辅也。……维制四方，上辅天子。

鱼网之设。（《邶风·新台》）郑玄笺：设鱼网者宜得鱼。

（用“是”、“之”标记宾语前置）

郑玄注《诗经》，将上述两种类型的前置宾语置于动词之后。这说明：郑玄所处的东汉时期，人们对于上述两种类型的宾语前置句已经十分陌生了，不特别注明，则难以理解。换句话说，上述两种类型的宾语前置句已从口语中消失了。

对待传统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全盘否定，或兼收并蓄，都失之偏颇。当坚持一分为二的原则，剔除其糟粕，汲取其精华，以达到批判地继承的目的。

（三）现代汉语的方言

方言和汉语史研究有很密切的关系，我国各地有非常丰富的方言材料，我们可以利用汉语方言更好地研究汉语史。

（1）汉语历史上有过的许多语言事实在现代方言中可以得到印证。

现代汉语的方言都来自古代汉语，由于形成的年代不同，也就不同程度地保留着上古汉语、中古汉语的痕迹。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汉语的方言可称得上是古代汉语的“活化石”。汉语历史上有过的许多语言事实在现代方言中可以得到印证。例如：

语音方面，清代学者钱大昕根据古代文献中的通假异文 [如“伏羲”即“庖羲”，“伯服”即“伯馮”，“士魴”即“士彭”，“扶服”即“匍匐”。“伏”、“服”、“魴”、“扶”等字，其声母为轻唇音（即唇齿音），“庖”、“馮”、“彭”、“匍”等字，其声母为重唇音（即双唇音）] 以及谐声（如从“非”得声的有“辈”、“排”等字，“非”是轻唇，“辈”、“排”是重唇）等，提出“凡今人所谓轻唇者，汉魏以前皆读重唇”。^② 钱大昕的著名论点今天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钱氏的论点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得到了印证。比如：厦门白话音“范”读 [paŋ]，“分”读 [puŋ]，“方”读 [paŋ]，“芳”读 [p^haŋ]；梅县“斧”读 [pu]，“肥”读 [p^hi]，“缝”读 [p^huŋ]。

① 详见孙良明：《古代汉语语法变化研究》，106~124页，北京，语文出版社，1994。

② 见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五（《四部丛刊》本）。

词汇方面，不少古词古义还保留在现代汉语方言中。如：

上古说“走”是跑的意思，说“行”是走的意思；“走”、“行”的古义依然保留在今广州话等方言中。

用水浇灌，普通话说“浇”，上古说“沃”。《说文·水部》：“沃，溉灌也。”段注：“自上浇下曰沃。”今福建龙岩方言仍说“沃”，如“沃菜、沃水、沃肥”。

（从水中）捞取，上古说“漉”。《说文·水部》：“漉，浚也。”又：“渗，下漉也。”《广韵》：“漉，渗漉，又沥也。”“漉”是让水通过障碍流走。引申为“（从水中）捞取”，如《齐民要术·饼法》：“须即汤煮，箆篱漉出。”今福州话“（从水中）捞取”仍说“漉”（与“鹿”同音）。

（2）汉语方言为古音系统的构拟或重建提供了依据。

传统“小学”关于音韵的研究，无论韵书、韵图的编纂，还是理论上的探究，都停留在音类（声类、韵类、调类）的区分上（如《广韵》的二零六韵，顾炎武的古韵十部，段玉裁的古韵十七部等），至于音类的实际音值，音类之间的差异，历来的韵书都无法做出具体的、语音学的描写。例如：古人的“等韵图”将《广韵》的二零六韵分为四等，但一等的主要元音如何？二、三、四等的主要元音又如何？清代学者江永在《音学辨微》中描写道：“一等洪大，二等次大，三四皆细，而四尤细。”这种描写显然是模糊的。真正的汉语古音系统的构拟或重建，始于20世纪初的瑞典语言学家高本汉（B. Karlgren）。^①高本汉将历史比较法运用到了汉语的研究中，在现代33种汉语方言材料（包括日译吴音、日译汉音、高丽译音、越南译音等四种域外方言，即借音）的基础上，根据现代汉语各个方言的差异，重建了《广韵》音系。有了高本汉以及后来的音韵学家的拟音，我们不仅对《广韵》二零六韵的音值有了感性的认识，而且对“等韵图”中的“等”的区分也有了较为科学的理解。例如：山摄一等韵“寒”（-an）、二等“删”（-an）与三等韵“仙”（-ien）、四等韵“先”（-ien）的区分，首先在于介音的有无，一、二等韵无[i]这样舌位又高又前的介音，所以声音显得“洪大”；其次是主要元音的发音部位的不同，由a—a—e—e，一等韵至四等韵，其主要元音的发音部位（舌位）逐渐由后至前、由低向高移动。

在使用方言材料时，需要注意系统性和方言自身的演变规律。比如，中古的知组声母字在一些湘、赣方言中读舌尖音，早先认为这是“古无舌上音”的证据。但是如果把考察的范围扩大，就会发现这些方言中不仅中古知组字读舌尖音，章组字甚至庄组字都有读舌尖音的，这种现象并非是古音的遗留，而是方言自身演变的结果。^②汉语方言中普遍存在文白异读现象，有一种倾向认为白读音往往反映较古的层次，其实不尽然，需要具体分析。比如，北京话“客”文读为[k^hʏ]，白读为[tɕ^hiɛ]；白读音韵母已经产生-i，声母已经颚化为舌面音，显然是晚近的发展。

① 参见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② 参见蒋希文：《湘赣语里中古知、庄、章三组声母的读音》，载《语言研究》，1992（1）。



(四) 外语借词

古代朝鲜语、日语、越南语都曾从汉语里借去大量词语，现在还保存着当时的一些读法，可以作为汉语古音构拟的旁证。

如，汉语里的古奉母，现代日语吴音都读 [b]，^① 可以证实“古无轻唇音”的说法。

又如“三、方、湿”，“高丽音”分别读作 [sam]、[pan]、[sɯp]，^② 从中可以看出古汉语的遗迹。（游汝杰“《社会语言学与方言学专题》讲义”）

此外，汉译佛经中的梵汉对音材料，也可以为汉语语音史的研究提供一些可靠的线索。例如，从唐玄奘的译著的梵汉对音可以窥见当时中原语音中入声的变化。^③

除外语里借汉语的词之外，汉语里借外语的词作为汉语史的材料也是非常珍贵的。如“佛”的原音是 buddha，最初译为“浮屠”和“浮图”，稍后译为“佛图”和“佛陀”，简称为“佛”。可见由上古直到隋唐，“浮”和“佛”仍读重唇；“佛”字当时有-t尾（物部，並母），比“浮”（幽部，並母）译得较为正确；汉代的“屠”和“图”念 da（鱼部，定母），所以拿来译 buddha 的第二音节，到了唐代，“屠”和“图”（同都切）不念 da 了，所以换成念 da 的“陀”字。^④

上述 4 个依据，归结起来，不外乎王力先生所说的两种材料，即历史文献和各地方言。在汉语史的研究中，无论是忽视历史文献，还是忽视各地方言，都是不可取的。

四、汉语史研究的方法

(一) 归纳法

传统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都是归纳法。例如：研究《诗经》韵部的系联法。

① 外语借词中也存在着类似“文白异读”的现象。例如：日语里的汉语词汇有吴音、汉音和唐音之别。吴音是模仿中国唐代以前的南方语音的，汉音是模仿中国唐代长安一带语音的，唐音是模仿宋明清时代的语音的。如“京”字的三种读法：在“东京”里读作 [kyō]（吴音）；在“京畿”里读 [kei]（汉音）；在“南京”里读作 [kin]（唐音）。又如：越南语里的汉语成分至少可分为两个层次。最早的一层是古汉越语，指汉至唐初传入越南的零星的汉字汉音，例如“箸、舞”越南语读作 [dua4]、[mua5]。这些字音带有上古汉语的特点。第二层次是汉越语，指唐代之后大量输入越南语的成系统的汉字和汉音。例如“六、难、见”在越南语里分别读作 [luc6]、[nan1]、[kien5]。这些字音带有中古汉语的特点。汉越语大多见于越南语的文言。唐代的科举制度促使今越南地区的知识分子诵读汉文的经典、书籍，从而造成系统的汉越语。

② 朝鲜语里与汉语有关的字音称为“高丽音”。

③ 唐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韵尾有相混现象，而相混的程度，入声字比阳声字多，而入声字收-t、-k 的字又多于收唇音-p 的字。这表明：（1）入声似乎还没有消失，因为对音的主流还是用入声字去对译收-p、-t、-k 的梵音；（2）收-t、-k 的入声字的韵尾已开始弱化（可能收-ʔ），因而才有相混的现象，用入声字去对译开音节（如：《切韵》收-t 的字“刺”对译 rab、ra）；（3）-t、-k 的弱化比-p 厉害（收-p 的入声字只与同部位的-m 相混）。

④ 参见王力：《汉语史稿》，23 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原书将中古全浊声母构拟为送气音，现按王力先生晚年的意见改为不送气音。

在归纳的基础上进行比较（或是形式的，或是内容的，或是功能的，等等），是运用归纳法进行汉语史研究的最基本的做法。有共时的比较，如某一历史文献内部语言现象（如词类、句式）的比较，或某一历史时期几部专书语言现象的比较等；也有历时的比较，即通过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的比较，考察某一语言现象的历史变化。

归纳法是汉语史研究最基本的方法，无论是下文提到的历史比较法，还是结构分析法，都离不开归纳法。

（二）历史比较法^①

历史比较法是比较方言或亲属语言的差异以探索语言的发展规律的一种方法，是汉语语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

历史比较法的基本内容是通过两种或几种方言或亲属语言的差异的比较，找出相互间的语音对应关系，确定语言间的亲属关系和这种关系的亲疏远近，然后拟测或重建它们的共同源头——原始形式。从语言的空间差异探索语言的历史发展是历史比较法的重要原则。例如：高本汉根据现代汉语方言的差异重建《切韵》音系。

运用历史比较法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在搜集比较材料时，要注意材料必须是基本核心词（如：代词、亲属称谓、身体各部位的名称以及日常生活通用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要注意区分同源词和借词。例如：不能根据日语从汉语借去的词语而说日语和汉语有亲属关系。

（2）在确定语言差异的年代顺序时，要注意把方言分歧现象的比较和历史文献材料结合起来。例如高本汉重建《切韵》音系，利用反切、韵书等已知确切年代的历史材料，力图克服历史比较法的局限。

历史比较法的局限：

（1）重建的原始形式属于哪一个时代无法确定，因而拟测出来的原始形式都被看成为同一年代层次上的语言现象。其实不一定。

（2）历史比较法只讲语言的分化，无法解释由于语言间的接触而产生的扩散与渗透现象。

（三）结构分析法

结构分析法的理论基础是德·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说。德·索绪尔认为语言是由语言符号所组成的一种系统。按照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语言中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构成语言的系统。我们现在分析、描写语言现象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谈及语言系统（如语音系统、语法系统、词汇系统等），要涉及语言的单位（如：音位、音节、语素、短语等）、结构层次、分布等，其实这都是在运用结构分析法分析、

^① 参见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描写语言现象。

结构主义语言学将语言学严格地区分为共时和历时两个层面，并将结构分析法主要用于共时语言系统的描写和分析。我们认为，共时和历时只是语言研究的两个视角，而非语言本身的两个层面。汉语许多共时的语言现象的变异需要借助历史演变参数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例如：现代北京话的塞音音位，分属“一送气”、“十送气”两个聚合群。这两个聚合群在与阳声韵（收鼻音韵尾）组合时，“一送气”的音位都没有阳平字，而“十送气”的音位才有阳平字。如：

“一送气”音位：阴平——般 奔 边 单 当 端 光
 “十送气”音位：阴平——潘 喷 篇 滩 汤 湍 筐
 阳平——盘 盆 便 檀 堂 团 狂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这就需要做历史的考察。中古汉语浊塞音在北京话中清化，依声调的平仄并入相应的送气或不送气清音：

b—仄：p 步 部 备 抱 / 平：p^h 蒲 菩 爬 皮
 d—仄：t 杜 道 豆 但 / 平：t^h 徒 桃 头 谈
 g—仄：k 共 柜 / 平：k^h 狂 逵

凡阳声韵中的平声字，因为其声调是“平”的，所以其浊塞音在现代北京话中都变成了送气音。因此，“一送气”的音位在与阳声韵组合时，不可能有阳平字。为什么“一送气”的塞音在与阴声韵组合时，有阳平字，那是“入派三声”的结果：

“一送气”音位：阴平——巴 多 歌
 阳平——拔 夺 格（古入声字）

上述举例表明：在语音系统中，音位的历史变化是成系列的，不仅反映在聚合群内部，也反映在音位的组合关系中。^①

汉语史研究的基本步骤：（1）根据研究目标的需要，确定若干个历史层面（如春秋战国、汉代、魏晋南北朝、唐代、宋代等）；（2）在每个历史层面确定若干部具有代表性的文献（如春秋战国——《左传》、《论语》、《孟子》、《战国策》等，汉代——《史记》、《论衡》等，南北朝——《世说新语》、《齐民要术》等，唐代——《敦煌变文》、《祖堂集》等，宋代——《朱子语类》、《五灯会元》等）；（3）对各个层面语料中的研究对象（如词类、句式、语义场等）进行界定，进行共时的分析、量化的描写，归纳出该语言现象的聚合特征、组合特征；（4）对各个层面归纳出的结果进行历时的比较，进行动态的研究，力图勾画出该研究对象历史变化的轨迹；（5）在汉语史的大背景下（还可以在跨语言的背景下），对语言现象的历时变化做出解释，探讨原因（语用推理、语言接触），总结规律（类推、重新分析、借用）。当然，最后一点已

^① 以上分析引自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不仅仅是归纳，演绎已在其中了。^①

五、汉语史的分期

根据汉语的发展变化，汉语的历史可以分为若干个不同的时期。关于分期的标准，主要有两种意见：

吕叔湘先生以文体（“文言”、“白话”）的转变作为分期的标准，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为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大阶段，认为现代汉语只是近代汉语的一个阶段（《近代汉语指代词·序》）。

王力先生以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作为分期的标准，认为应该以语法作为主要的根据，主张将汉语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个时期（《汉语史稿》）。

现在学界大多采用王力先生的分期标准。但关于汉语史具体的分期，以及各个时期的上限、下限，学界仍有不同的看法。^②

下面按照王力先生汉语史的分期，简要介绍一下各个时期汉语的特点。

（一）上古期（公元3世纪以前）

（1）语音上，以《诗经》音系为代表：无轻唇音、舌上音、正齿音，以母为流音；阴声韵、阳声韵、入声韵三类配合，一、二等韵的区别为介音不同；入声分长入、短入两类。

（2）词汇上，以单音词为主，音变构词是主要的构词方式，词汇复音化的趋势已然开始。

（3）语法上，判断句不用系词，疑问句和否定句的代词宾语通常置于动词之前。

（二）中古期（南北朝至南宋前半）

（1）语音上，以《切韵》音系为代表：以母变为半元音，舌上音、正齿音已经分化出来，后期轻唇音也分化出来；入声韵与阳声韵相配，一、二等韵由介音不同演变为主要元音不同；声调分平上去入四声，长入声变为去声，后期全浊声母上声字变为

^① 目前学术界提出新的方法——二重证据法。这一方法是把“历史文献考证法”和“历史比较法”结合起来，加以融合，形成汉语史研究中的新方法。早在20世纪初，王国维就提出“地下之新材料”补证“纸上之材料”的“二重证据法”。汉语史的研究初步表明，“二重证据法”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是可取的。

^②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采用“五分法”，认为《诗经》以前是太古汉语，《诗经》以后到东汉是上古汉语，六朝到唐是中古汉语，宋代是近古汉语，元明是老官话。日本汉学家一般采用“四分法”，把汉以前称为“上古”，把六朝至唐末称为“中古”，把宋元明称为“近世”，把清代称为“近代”。蒋绍愚倾向于采用“三分法”，即把汉语史分为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并认为近代汉语的上限是晚唐五代，下限当定在清初。孙锡信主张“六分法”，即上古前期（殷商西周）、上古后期（东周至西汉）、中古时期（魏晋南北朝）、近代前期（隋唐至北宋）、近代后期（南宋至明）、现代时期（清初至今）。